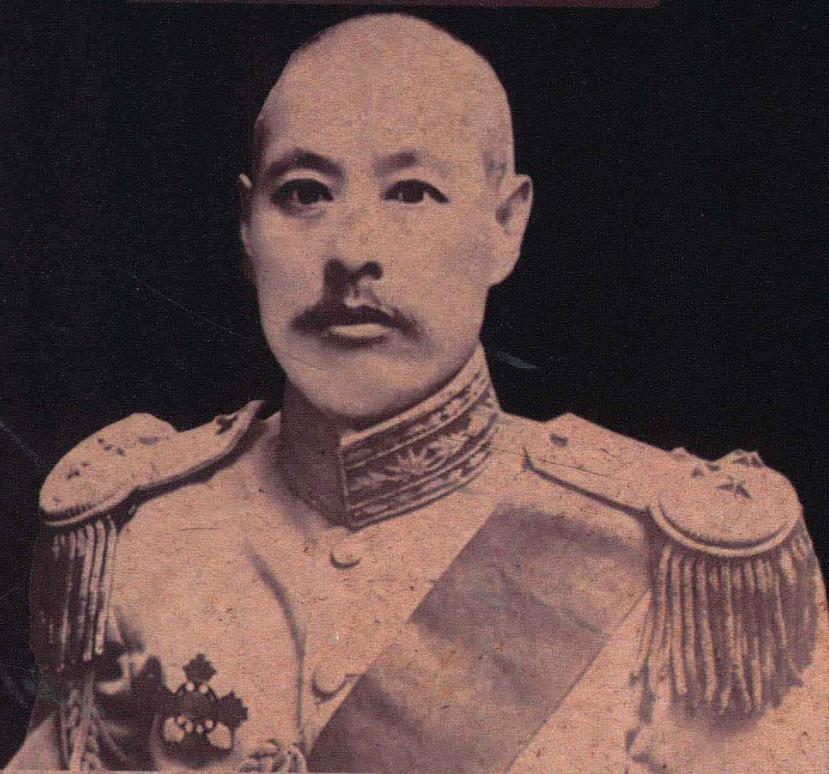


# 中国近代军系丛书

直军

宫玉振著



## 长期控制中国政权，直皖战争的胜利者

代表人物为冯国璋、曹锟、吴佩孚、孙传芳

曹锟——贿选窃踞总统职位 冯国璋——袁世凯的左膀右臂，袁称帝后公开反袁



山东人民出版社

中国近代军系丛书



宫玉振 著



山西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直军/宫玉振著. —太原: 山西人民出版社,  
(2012.1重印)

(中国近代军系丛书)

ISBN 978-7-203-03854-2

I . ①直… II . ①宫… III . ①直系军阀—史料 IV .

①K258.20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1) 第224288号

---

**中国近代军系丛书 直军**

---

**著 者:** 宫玉振

---

**出 版 者:**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山西人民出版社

**地 址:** 太原市建设南路21号

**邮 政 编 码:** 030012

**发 行 营 销:** 0351-4922220 4955996 4956039

0351-4922127 (传真) 4956038 (邮购)

**E-mail:** sxskcb@163.com **发 行 部**

sxskcb@126.com **总 编 室**

**网 址:** www.sxskcb.com

---

**经 销 者:**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山西人民出版社

**承 印 者:** 北京燕旭开拓印务有限公司

---

**开 本:** 710毫米×1000毫米 **1/16**

**印 张:** 17.5

**字 数:** 299千字

**印 次:** 2012年1月第2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03-03854-2

**定 价:** 32.00元

---

**版权所有 违权必究**

**本书若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我社联系调换**

# 序

武装力量是国家或政治集团的各种武装组织的总称，一般以军队为主体，由军队和其他正规的、非正规的武装组织组成。一个国家的武装力量(军队、军事集团，亦称军系)的形成发展、沿革、编制体制、军费军饷等与国家、民族及社会的命运是息息相关的，并对社会的发展产生着重要的影响。

中国近代社会历史自19世纪40年代初鸦片战争以来，至20世纪20年代初出现了新的特点，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遭到破坏，并逐步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演变。随着外国资本主义势力的入侵，打破了中国固有的自给自足的封建自然经济，在封建地主阶级之外又出现了一个为外国侵略集团服务的买办资产阶级。在这一新特点下，武装力量及军事政治集团等遂成为维护封建地主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利益的工具。在这段历史中间，军队及军系逐渐由古代军队向近、现代过渡，并经历了帝国主义侵略和中国人民反侵略的战争以及大规模的、连年的军阀混战，由此出现了中国近代军系十分复杂的变迁活动。

中国晚清社会所出现的湘军，即是中国近代军系的重要一支。淮军则为湘军首领曾国藩在剿杀太平天国农民起义中深感湘军兵力不足的条件下所组成的新的勇营武装，同为中国近代军系的重要一支。1897年，清政府在论及清代军制沿革时指出：“我朝定鼎中原，当时所用仅止八旗劲旅而已，无敌于天下；其后额设绿营制兵，多或六十余万，少亦五十余万，较之八旗不啻倍蓰。乃粤匪、捻匪、川匪……之乱，制兵竟不足恃，于是加饷挑练而有练军，招募勇丁而有湘军、楚军、淮军、毅军。”曾国藩、李鸿章所办湘淮两大武装集团正是在这样的条件下而形成的。

曾国藩办团练的方针，是以封建宗法关系控制将领和军队。湘军各部，上自统领，下至哨长、士兵，从其开始招募成军，即是以同乡、亲友、师生家族关系和裙带关系为纽带而维系起来的武装集团。湘军营制为“帅欲立军，拣统领一人，檄募若干营。统领自拣营官，营官拣哨官，以次下之，帅不为制。故一营之中，指臂相联，弁勇视营哨，营哨视统领，统领

视大帅，皆如子弟之事父兄焉。或帅欲易统领，则并其军撤之，而令新统领自拣营官如前制。或即其地募其人，分别汰留，遂成新军，不相沿袭也。”学者王闿运在论及湘军时说：“湘军之可贵者，各有宗派，故上下相亲”；又说：“从湘军之制，则上下相维，将卒亲睦，各护其长，其将死，其军散，其将存，其军完。”上述这些论及道破湘军的宗派性质。继之而起的李鸿章淮军，也是承袭湘军这套办法而形成的一支军队。湘淮军不仅营制一脉相承，其政治理念亦相当传统。曾国藩、李鸿章等人都具有浓厚的封建忠孝义礼意识。

湘、淮军在镇压太平军、捻军之后，一部分军队裁撤，大部分留驻各地成为防军，并逐步取代原有的八旗、绿营而成为清朝的常制军队。随此而出现的是湘、淮军集团控制了全国许多省区军民两政的实权。清朝末年，湘、淮两个集团，长期分别盘踞了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和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重要职位，形成相当大的地方势力，其间社会历史的重大问题，几乎都与湘、淮军集团紧密相关，成为近代中国举足轻重的军事政治集团势力。

湘、淮集团活跃于19世纪下半叶，在此后的半个世纪内，中国的政治军事形势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然而在晚清，清王朝的中央集权制度虽然受到了一定的削弱，但是中央政权仍然具有相当的权威，它所使用的相互牵制等策略还能对湘、淮集团产生实际的制约作用。因此，湘淮集团与清朝中央不仅在形式上存在着体制的联系，而且在实际上还受到这种体制的制约。随着近代社会的变迁，湘、淮等军系的消亡，代之而起的是一个更大的、不断进行割据和争雄的军系——北洋军阀集团。在中国近代历史上，从1912年起至1928年是北洋军阀统治时期。以袁世凯为代表的北洋军阀集团从小站练兵开始，到国民革命军北伐成功为止，中国的内忧外患，莫不和这个集团联系在一起。

北洋军军系，其起源可追溯至清末的湘军和淮军。

1901年袁世凯继李鸿章之后，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袁利用手中控制的政治、经济、军事权力，以小站练兵时所形成的班底为骨干，一方面乘机扩充北洋军事力量，一方面不断在中央和地方安插亲信，由此形成了北洋军事政治集团。

袁世凯经营培植北洋军阀集团最根本的一条，就是培植亲信，组成宗派势力，并掌握了一支唯袁命是从的北洋新军，而这支军队“其心理中不知有清廷，而唯知有项城耳”。袁非常崇拜曾国藩“起自团练，创办湘军”的治军方法，并加以发展，在其手下网罗了一批忠于他的亲信、心腹、死党。北洋军事集团主要由三部分人构成：第一是追随袁世凯多年的“家兵家将”；

第二是北洋武备学堂的毕业生；第三是淮军旧将。这些人多生长于清王朝封建政治文化影响较深的北方农村，未成年时即受到军功发迹至显风俗的熏陶，具有极端强烈的求取功名和升官发财的欲望。尤其是北洋武备学堂的学生，他们大都出身寒苦，有着顽固的自强精神和极强的政治追求欲，而其在淮军“诸将领多以行伍起家，谓功名自马上得之，于军学多漫语姗笑，……毕业诸生多淹滞佗傺”，由于这些人在淮军中得不到重用，迁升太慢，心理压抑甚大，一旦受人提拔，即产生较浓的为个人所用和报恩的思想。袁世凯把他们召至新建陆军，破格提拔为各级军官和教习。如号称北洋“三杰”的王士珍、段祺瑞、冯国璋，以及段芝贵、曹锟、李纯、王占元、陆建章、杨善德、卢永祥、鲍贵卿、张怀芝等均出身于这一学堂。

除了武备学堂毕业生外，袁世凯对“家兵家将”和淮军旧将亦加以笼络和提拔，袁世凯曾语，“到底不识字的人靠得住”，在新建陆军章制中，袁世凯订立了所谓“兼充”制度，即“统领以各分统兼充。分统以各营统带兼充，冀可省官节费”，实际上袁氏却借此来控制其部属，凡是顺从和巴结他的将领便擢升兼充分统或统领。

袁世凯还通过自办的各类军事学堂培养效忠自己的军官。如新建陆军之初，即设“随营军事学堂”，培养新军干部。嗣后，1902年在保定设“北洋随营将弁学堂”，1905年设北洋军医、军械、经理等学堂。1906年设“保定军官学堂”，训练北洋新军扩军后的军事骨干。袁世凯规定“此后训练新军，所有军中委用人员，应先尽曾习武备暨曾带新军者选择委用”、“造成军后，遇有官弁出缺，仍先尽学堂毕业之员选充”。袁用人的标准是任人唯北洋派是亲。北洋六镇新军的镇、协、标各级统兵官，几乎是清一色的北洋系，绝少外省武备学堂毕业生或外省留日学生。故北洋六镇的军事骨干，多是袁氏的门生故吏，视袁为衣食父母。

不仅如此，袁世凯还广为招揽其他类型的人才。1901年，袁世凯接任直隶总督，他的政治野心逐渐扩大。为了攫取更大的政治目标，他开始招揽各种政治人才进入他的幕府，其政治录用方式日趋多元化。一方面，吸收了大量受过封建政治文化影响的文治官员，一方面也吸引了其他政治集团的成员进入北洋集团，形成了北洋官僚集团势力。其一，袁世凯利用政治亲缘关系来网罗他的政治势力，明目张胆地将任用亲朋、乡党视为近代意义的结党。他所任用的亲信大都是亲朋、同乡、同僚、部属、门人、恩人、结义、姻亲等。如徐世昌堪称是北洋官僚集团的幕僚长，他是在同袁世凯长期合作中与袁结成生死之交的。袁资助他进京应考，后考中举人、进士，做了翰林院编修。袁世凯将他调到小站，管理参谋营务处，以后又多次向清廷“保荐”

他，使徐世昌从此平步青云。唐绍仪在袁世凯镇压朝鲜“壬午兵变”时与袁结识，后充任袁世凯在朝鲜的翻译。甲午战争前夕，唐冒死护送袁世凯离开汉城，登舰返国。袁小站练兵后，就委任唐为营务处帮办，袁任直督后，唐一直追随左右，设立邮传部后，袁保荐他为该部侍郎，一手把持部务。袁世凯还将有亲友、同乡或家中佣人的子弟关系之人安插于政治、经济部门，以便于自己控制。袁世凯最贴身的内务总管袁乃宽，是袁的同乡，后来认为本家，被袁委任协助控制军政机要和掌管银钱的要职。周学熙、刘永庆、张镇芳等人都因与袁世凯有亲属关系而为袁所重用。袁世凯还利用联姻来扩大政治亲缘关系网，以控制国内军政部门。其二，袁世凯任直隶总督后，继续以官位利禄为诱饵，网罗各种政客、文人、理财家为其所用。如朱家宝、齐耀琳、孙宝琦、张锡銮、杨士骧、杨士琦、赵秉钧等一帮文职人员即是在这官禄利诱下，进入北洋集团，而成为其重要干将的。其三，袁世凯善于利用“金钱效应”扩展自己的政治势力。在清末社会，传统的儒家政治准则已被抛弃，清王朝官场的腐败现象日趋表面化，卖官鬻爵、行贿受贿屡见不鲜。袁世凯在发挥“金钱效应”上，则无所不用其极。通过金钱途径，袁世凯陆续使领班军机大臣奕劻，总管内务府大臣世续、荫昌、太监总管李莲英等清廷内重要角色纳入自己的集团范围内。其四，袁世凯还善于利用政治投机来扩充自己的政治、经济实力。在清末社会，各种政治势力迭起，改革潮流澎湃，袁世凯则以“开风气”自诩，屡屡上疏言新政，借以博取时誉，扩充自己的政治影响。袁世凯通过举办新政，网罗了一批实业家和理财家，扩充了北洋集团的经济实力，同时也博得了北方中小资本家的信赖和支持。到了1905年，日俄战争结束，立宪的小国日本战胜了专制的大国俄国，国内民族资产阶级上层要求立宪的呼声日益强烈。袁世凯集团也受社会政治环境的影响，其政治文化亦属入立宪政治色彩。由于以袁为首的北洋集团以立宪的政治文化相标榜，这一集团对国内外的立宪派人士都有很大的政治辐射力。留日学生金邦平、黎渊、李士伟等人回国后，纷纷投到袁世凯幕下。在立宪派中独树一帜的杨度，从日本回国后也转到袁世凯幕下，成为袁世凯宪政问题的重要参谋。

由于北洋军事政治集团势力的极大膨胀，至清末，北洋军阀军事政治集团，基本上控制了直隶、山东、江苏、安徽、河南、东三省等省区及中央一些部院的实权。1908年袁世凯遭监国载沣等皇族亲贵的猜疑被罢官隐居河南，但由于其亲信爪牙的维护，使清政府对其也莫可奈何。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袁世凯东山再起，凭借北洋军系的实力篡夺了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成为中华民国的正式大总统。嗣后，在北洋军阀集团势力控制下的北京政府

历届总统、执政、大元帅、国务总理、各部总长，各省督军、省长、镇守使等军政大员，多出自该军阀集团。此间，军阀集团势力与中央政权的关系已发生了完全的逆转。中央的权威消失了，军阀实力派已经完全实现了军事力量与地方政权和财权的三者合一。因而，他们也就变得更加强硬起来，无组织、无原则则是公开的，肆无忌惮的。

1916年袁世凯病死，北洋军阀集团发生了分裂，其内部各派乘机发展各自的势力，帝国主义为争夺在华利益也各自寻找自己的代理人。于是，北洋军阀分裂演变为三大派系：

一是日本支持的以时任国务总理兼陆军总长段祺瑞为首的皖系军阀集团，主要控制皖、陕、鲁、浙、甘、闽等省；二是英美支持的以时任副总统冯国璋为首的直系军阀集团，主要控制苏、鄂、湘、直、赣等省；三是日本支持的以时任奉天督军兼署省长张作霖为首的奉系军阀集团，主要控制东北地区。此外，各地方的一些军阀或独立或分别依附于各大派军阀。他们相互间为了争权夺利，造成连绵不断的军阀混战。皖、直、奉三大军系军阀为争夺对北京政府的控制权，更是经常爆发大规模的战争。随着战争的胜负，北京政府的实权，也就在各派大军阀手中转移。在此期间，北京政府所谓的总统、执政、大元帅就多次更换，内阁总理的更迭就愈加频繁，从1916年至1928年短短的13年中，就产生了38届内阁。以段祺瑞为首的皖系军阀，在其控制北京政府期间(1916.6—1920.8)，中国表面上是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实际处处依赖于日本，直接或间接受其操纵。日本在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大力支持皖系军阀。皖系为实现“武力统一”目标，对南方护法各省连年发动战争，力图消灭以孙中山为代表反对北洋军阀势力的护法运动。

至1920年，皖系皖军已达11个师、17个混成旅的兵力。直皖战争后，皖军战败，京津地区及豫、鄂、察、陕等省的皖军被缴械，仅余淞沪地区和浙、鲁、闽、皖等省的残余部队以及依附于皖系的地方军队。直皖大战后，直系军阀取代皖系控制了北京中央政权。此时的直军，已扩充至18个师、18个混成旅，共约20万人，占据了北方和长江流域的大部分地区。

1920年直皖战后，皖系实力大部消失，奉系企图控制北京中央政府的野心大增，故而更加积极向日本靠拢。此时的奉系奉军乘机占据绥远和京山铁路沿线地区，兵力膨胀至5个师、26个旅，约20余万人。为争夺北京政权的控制权，1922年爆发第一次直奉战争。此次战争以奉军战败全部退回关外而结束。直系则大肆扩充实力，至1924年夏，陆军已达21个师、17个混成旅，共25万人。同年9月，直军发动江浙战争，皖军实力消失。

其间，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直军战败，奉军势力大增，除东三省外，

奉军还占据了热、直、豫、鲁、苏、皖等省区。至1925年其实力达35万，并控制了北京政权。10月，直军对进入苏皖的奉军进行了反击，奉军退回北方。至此，除奉军张作霖部外，奉军还有张宗昌的直鲁联军约20万人。而直军吴佩孚部计20万人，盘踞于鄂、豫和京汉铁路沿线；直军另一山头的孙传芳部盘踞于浙、闽、苏、皖、赣五省，计20万人。

国共合作的北伐战争将直军大部歼灭。为挽救失败，直奉两军阀再度联合。至1927年3月，北伐军击败了直奉的五省联军。1928年4月，南京国民政府经过二期北伐，直系直鲁联军消亡，奉军败退关外，12月，奉军宣布东北“易帜”，奉军改为东北军。至此北洋各大系军阀集团覆灭。北洋军阀的统治期间，由于连年内战，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空前灾难。从民国初年至1932年，仅四川军阀混战478次，四川一省如此，全国各地频繁爆发的大小军阀混战，虽无统计资料，但以此类推，即可想见一斑。

中国近代军系发展的历史是中国近代史的重要分支，研究自鸦片战争以来至北洋军阀消亡这一历史时期中国近代军系发展史，对于了解这一时期各军系的兴亡盛衰，对于从那些已经消失的人和事中叩问历史，总结历史经验，是有着一定现实意义的。它不仅可以恢复人们对近代历史创痛的记忆，深刻地认识和总结中华民族辛酸的过去，而且可以通过正反两个方面的比较，更好地领悟中华民族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走上推翻“三座大山”必由之路的深刻历史原因和社会原因，并将其转化为民族奋进和振兴的精神力量。

这一套丛书涵盖了作为中国近代主要军系的湘军、淮军，和由湘淮军演化而成的北洋军，以及袁世凯死后由北洋系分裂出来的三大派军系的皖军、直军和奉军的形成、编制体制、军事实力、作战、发展沿革及其覆灭的历史。由于取材广泛，叙事生动，既有严肃的史实论述，也有涉及清末和民国政坛内幕的名人逸事，同时又引用了不少可供参考的有用史料，如果读者能从中了解一些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所遭受的磨难和耻辱以及随之而来所进行的不屈的抗争历史，并能从中了解和掌握中国近代军系历史发展的基本脉络，我们的目的就达到了。

田玄 皮明勇

1997.10

# 目 录

<b>第一章</b>	袁世凯小站练兵 北洋军皖直分流	001
<b>第二章</b>	冯元首和战两难 曹督军左右逢源	018
<b>第三章</b>	小秀才脱颖而出 大总统黯然引退	038
<b>第四章</b>	吴师长撤防北归 京汉路直皖大战	057
<b>第五章</b>	回洛阳子玉练兵 出武昌子春受骗	077
<b>第六章</b>	倒内阁吴张斗法 争高低亲家翻脸	106
<b>第七章</b>	换总统保洛分裂 行恶政曹吴合污	127
<b>第八章</b>	斥异己将士离心 搞削藩秀才失算	152
<b>第九章</b>	江浙间先燃战火 直奉军再起烽烟	171
<b>第十章</b>	吴佩孚湖北复出 孙传芳扬威东南	198
<b>第十一章</b>	战湘鄂子玉丧师 失闽赣馨远拜山	224
<b>尾 声</b>	直系军风流云散 众枭雄各赴黄泉	243
<b>附录一</b>	直军大事年表	247
<b>附录二</b>	直军主要将领传略	258
<b>附录三</b>	直军主力各师源流	265
<b>附录四</b>	主要参考文献	267

## 第一章

# 袁世凯小站练兵 北洋军皖直分流

### (一) 引子

说书的讲究有个“引子”，谈史的讲究有个缘起。拙著名叫《直军》，讲的自然就是直军的历史。但要谈直军，就得先谈北洋军；要谈北洋军，就得费点笔墨，从袁世凯小站练兵谈起了。

且说大清光绪二十年，也就是公元1894年，中日之间，发生了甲午战争。日本侵略军不宣而战，水陆并进。可怜李鸿章经营多年，陆上的淮军一溃千里，海上的水师全军覆没。换了刘坤一率领湘军出关，依然挽救不了败局。无可奈何，大清国只好向蕞尔岛夷的小日本求和。马关签约，赔了“战费”二万万两白银，割让了台湾、澎湖和辽东半岛。只是由于日本胃口太大，引起俄、德、法三国嫉恨，才演了一出“三国干涉还辽”的闹剧。大清国又出了白银三千万两，总算“赎回”了辽东。

这一仗打完，赔款割地，丧权辱国，上上下下，都十分震惊。痛定思痛，“同治中兴”的神话算是破灭了，什么湘军、淮军，什么防军、练军，都是靠不住的。就像那纸糊的老虎一样，一扯就破。瓜分豆剖，亡国的威胁就在眼前了。回过头来看，小日本打败大清国，靠的是西法练兵。中国的当务之急，就是赶紧像日本那样，仿用西法，创练新式军队，来个“整军经武、以救危亡”。

1894年的冬天，双方的仗还在打着，清政府就派出广西按察使胡燏棻，匆匆忙忙招募了4750名新兵，在天津和大沽之间一个叫“小站”的地方，成立了“定

“武军”十营，聘请德国人汉纳根做教官，开始用西法训练军队。

也合该袁世凯出头，“定武军”招募的工作还没做完，胡燏棻就另调新职，督造津芦铁路去了，遗下这支“定武军”，没有人统领。清政府决心物色一名“知兵大员”接替，找来找去，就找到了袁世凯。

袁世凯，字慰亭，河南项城人。按照过去的习惯，人们便称他为“袁项城”，或者直接称“项城”，就像称曾国藩为“曾湘乡”、张之洞为“张南皮”一样。

在当地，袁家也算是大族。他的叔祖父袁甲三官拜漕运总督，他的父亲袁保中位列巨绅，为地方一霸，他的叔父袁保恒、袁保庆、袁保龄也一个个爬上了高枝儿。

大家族的子弟，若非家教严格，往往娇生惯养。袁世凯自幼聪慧，很受溺爱，因而十八九岁了，仍是游手好闲，天天酗酒、跑马，与一帮顽少厮混。闲来无事，也读一点经书，作几首歪诗，但无非附庸风雅而已。家里看他已经成人了，该走正道了，便逼他参加科举考试。考了几次，自然是名落孙山。他倒并不在意，将诗文书籍一把烧掉，笑嘻嘻地说：

“大丈夫应当志在四方，怎么能困在笔砚之间来自误岁月呢？”

不久，他便效法那投笔从戎的古人，投到了他父辈的老朋友、庆军统领吴长庆的军中，两年之后，又随吴长庆入了朝鲜。

也许是天性就适于从军吧，几年下来，凭着他的机智和敢作敢为的作风，当然也靠着吴长庆的关系，居然一升再升。到后来他又拉上了李鸿章李中堂的关系，便更是官运亨通了，从一个毛头小伙子，变成了五品道员，改任“驻扎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

甲午战争爆发前夕，袁世凯回到国内。在朝鲜，他曾奉命替国王编练过军队。回国后，看到中国编练新军也已经势在必行，正是用人之时，他便赶紧请人捉刀，写了一部兵书，用自己的名字刊刻了出来，到处送人。这一来，他立时博得了“知兵”之名，连政府中的亲王、大臣们，也都知道出了袁世凯这样一个军事人才。

就这样，胡燏棻去职之后，他的祖坟便突然冒烟了——醇亲王奕譞、庆亲王奕劻、军机大臣翁同龢、李鸿章、荣禄都想到了他，就联名上奏，说他“朴实勇敢，晓畅军机，前驻朝鲜，颇有声望”，是接练新军的最佳人选。

皇帝很快就颁布上谕，批准了醇亲王等人的奏请。于是，袁世凯便走马上任，接了胡燏棻的摊子，开始了影响日后几十年中国历史的“小站练兵”。

小站原名新农镇，离天津大约70里，原来是个很荒凉的地方，淮军的一支曾在这里屯过田。自从铁路从这里经过后，便逐渐繁华热闹起来，小站的名字越叫

越响，新农镇三个字反倒没有人提了。

袁世凯来到小站，首先遇到的问题，便是急需一批军事干部。新军与旧军不同，关键在于“西法”，旧军可以从行伍中提拔将领，新军则是另起炉灶，非得通晓西方军事学术的新式军事人才不可。袁世凯便找到他的老朋友、满族人荫昌，请他介绍人才。荫昌是北洋武备学堂的总办，就向他推荐了第一届武备学堂的优等生梁华殿、王士珍。袁世凯仍然觉得不够用，又从武备学堂的毕业生中，物色到冯国璋、段祺瑞这两个人。

这四个人，除了梁华殿不久失事溺死之外，王、段、冯三人，就是日后著名的“北洋三杰”，有所谓“王龙”、“段虎”、“冯狗”之说。

三杰之名，据说出自德国教官的一言之赐。有一天，那位教官来北洋军营地观操，遍观诸军上下之后，用马鞭遥指三人的背影，说：

“这三个人，堪称北洋军中之杰。”

于是三杰之名，不胫而走。不过三人之中，王士珍以黄老立身，不爱多事，在政治上时隐时现，人们便说他“神龙见首不见尾”。段祺瑞、冯国璋二人，则日后再一为皖军领袖，一为直军的祖师爷。北洋军一分为二，与这两个人，有极大的关系。拙著是写直军的，那就先将冯国璋这个人物交代一下，也算正本清源吧。

冯国璋，字华甫，直隶河间人。幼时家中很穷，但冯国璋的母亲很有远见，节衣缩食，供冯国璋读书。

冯国璋人很聪明，也知道用功，因而成绩每每名列前茅，但唯独对于猎取功名的敲门砖——八股文，却不是很在行，因而“屡试不得志”。

27岁那年，家里实在无力供他了，冯国璋只好辍学。正好他有个族叔祖在大沽直字营中做幕僚，冯国璋想来想去，觉得投军倒也是一条出路，便去了大沽，在大沽统将刘祺的营次，做了一个走卒。

这刘祺也算是个儒将，闲来无事与冯国璋一聊，大吃一惊：没有想到一个跑腿的竟然饱读诗书，出口不凡！便生了爱才之心。正好第二年李鸿章要办武备学堂，从各营中挑选学员，刘祺便将冯国璋的名字给报了上去。

于是，冯国璋就成了武备学堂一期步兵科的学员，一学就是四年。他出身贫寒，科举又屡试不第，因而非常珍惜在武备学堂的学习机会。在校期间，他学了天文、舆地、格致、测绘，也学了行军、布阵、攻守和营垒炮台等科目，学习成绩十分突出。据说，在武备学堂一期学员中，被评为优等生的，炮兵科中首属段祺瑞和王士珍，在步兵科中，就得属梁华殿和他了。

虽然忙于学习军事，冯国璋却也并未放弃文化课。这时他的兄长们都入了县学，冯国璋自愧不如，便趁年假回籍，又参加了一次考试，不想这次竟然一试而捷，考了个第一名，当时称“案首”。武备学堂的学生，大多出自卒伍，在他之

前，还没有人文试得过功名，喜得当时任北洋大臣、直隶总督的李鸿章逢人便说：

“武校出文生了！武校出文生了！”

但在当时，淮军的将领大多起自行伍，谓“功名自马上得之”，对于新式军事学问，则甚为轻视，因而武备学堂毕业的学生，即使是像冯国璋这样的优等生，也不能得到重用。冯国璋毕业之后，留校当了几年教员。后来实在不安于位，便投到了聂士成的武卫军中。聂士成是武童出身，但对于冯国璋这位“武校文生”倒是很器重，冯国璋也就有了施展才干的机会。在甲午战争中，聂士成部屡立战功，据说与冯国璋“凡战术军储多资以擘画”是分不开的。

甲午战争之后，在聂士成的推荐下，冯国璋以军事随员的身份，陪同大清国驻日公使裕庚东渡日本，这给了他一个实地考察日本军事的绝好机会。在日期间，他到处参观军校，搜罗兵书，走访日军将校，其中包括陆军大将福岛安正、中将青木宣纯。返国之前，他将搜集来的军事资料和自己写的心得汇集了起来，成书几大册。回来之后，就将所著的兵书献给了聂士成。

聂士成是旧式军人，对这些新鲜玩艺儿不感兴趣。但念及部下的一片苦心，正好袁世凯要训练新军，便将冯的兵书推荐给了袁世凯。

袁世凯浏览一遍，顿时如获至宝，拍案大叫道：

“军界的学子，没有一个能超过这个人的！”

当下袁世凯便将冯国璋要了过来，委为新建陆军督操营务处帮办。梁华殿失事之后，又委为总办。

冯国璋一身才学，总算有了用武之地，因而也特别卖力，为袁世凯召集了一批兵学专家，讨论分析，就兵法、操典、营制、饷章以及各项图说，编成训练教材，大大方便了袁世凯练兵。《冯国璋事状》中说：

“袁公练兵，公固与有力焉。”

袁世凯对于冯国璋，也就十分器重，须臾不离。据说有关练兵的文件送到袁世凯处时，袁世凯总要先问一句：

“华甫看过了没有？”

冯国璋的职位，也就从督操营务处的帮办，迅速地升了上来：

1902年，升将弁学堂督办，北洋军政司教练处总办兼练官营总办；

1903年，升练兵处军学司副使，不久即升练兵处军学司正使，兼北洋陆军速成学堂、陆军师范学堂督办；

1904年，受命督练北洋陆军各学堂；

1905年，升北洋陆军第六镇统制；

1906年，派充贵胄学堂总办；

1907年，授陆军部军咨处正使；  
 1908年，补授镶白旗汉军副都统；  
 1909年，为陆军留学毕业生主考大臣。  
 .....

开列了这么多，未免有“不厌其烦”之讥了，但从中可以看出这样几个问题：

一是自从投到新建陆军(后为北洋军)以来，几乎是每年皆升，甚至一年数迁。冯国璋在北洋军中的地位，也就不言而喻了。

二是冯国璋在北洋军中所做的主要工作，是培养军官的军事教育工作，换句话说，冯国璋掌握着培养军官的大权，北洋军中的中下级军官，大都出自他的门下。不能小看了这一点，过去的中国，最重视的就是这“门生故吏”。因为门生故吏，最容易以座师上司为核心，结成势力。

对于冯国璋来说，也许他还不是有意在组织派系。但就在这时，后来直军的重要将领，却大多数已经聚集在他的周围：

李纯，最贴近他的心腹大将，后来的“长江三督”之一，此时在军政司教练处任提调；

吴佩孚，直军最能征惯战的将领，此时在测绘学堂学习；

孙传芳，直军的后起之秀，“五省联帅”，此时在练官营受训。

其他直军大将，如齐燮元、王承斌、杨文恺、熊炳琦、李廷玉、师景云等等，此时则在冯国璋任督办的北洋陆军速成学堂学习……

当然，冯国璋虽然与这些人关系比较近，但实实在在地讲，他恐怕还不敢存在北洋军中独树一帜的奢望。要想自成一军，首先得有自己的地盘、自己的军饷。这些，他都没有。

况且，袁世凯虽然很重用他，但袁之为人，一向多疑，即使对于自己的心腹，也时刻提防戒备，用各种手段，让几个重要将领齐头并进，互相牵制，不让他们形成自己的势力。熟知北洋内幕的张国淦曾经说：

“袁氏在日，军队统于一尊，并无派系可言，亦无人敢萌此想，敢为此说。”

不过，话说回来，虽然袁世凯在的时候北洋军形不成派系，但由于袁世凯有意在重要将领尤其是冯国璋、段祺瑞之间搞平衡，让这二人谁也压不过谁，二人的声名与地位，于是便始终不相上下。这样，袁世凯一死，北洋军中，就再也形不成一个新的中心，“群雄失驭，乃互植势力，各昵所亲”，这就为北洋军日后的分裂埋下了伏笔。

闲话少说，书归正传，还是来谈一谈直军的祖师爷冯国璋。

转眼之间，到了1911年。这一年，发生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就是辛亥革命。湖北的新军，在革命党人的领导下，造起反来。这下子一发不可收拾，南方各镇各协的新军，都响应起来，各省革命的革命，独立的独立，大清的江山，眼看就要不保了。

这一年，是宣统三年。宣统小朝廷一看不好，赶紧调兵遣将，去扑灭南方的革命。南方反了，能依靠的，便只有北方的军队，也就是袁世凯编练的北洋六镇了。

可是袁世凯早在三年之前，就被摄政王载沣以“足疾”为名，开回老家“养疴”去了。袁世凯被逐，实际是他与满族亲贵争夺权力斗争的结果，这里按下不表。问题是虽然逐了袁世凯，但出了乱子，还得靠袁世凯编练的北洋军。

当时的北洋军，正准备在永平举行秋操呢，也就是现在所说的军事演习。对于这次演习，北洋军上下都十分重视，被指定担任东路总统官的冯国璋，提前几个月就到了滦州。但是武昌这一出事，演习就没有办法进行下去了。

小朝廷立即下令：将北方陆军各镇编为第一、二、三军：

第一军，由第四镇、第二镇第三混成协、第六镇第十一协编成。

第二军，由第五镇、混成第五协、第三十九协编成。

第三军，由禁卫军及陆军第一镇编成。

初定第一军军统由荫昌担任，第二军军统由冯国璋担任，第三军军统由载涛担任。

具体任务是：

第一军，星夜驰援湖北，克期克复省城；

第二军，准备增援湖北；

第三军，守卫京畿。

计划倒是好计划，但问题是北洋军的领袖是袁世凯，经过袁多年的经营，北洋军早已只知有袁官保，而不知有大清朝。袁世凯不出山，北洋将士，哪一个肯卖力作战呢？

于是，第一军军统荫昌很快就发现，他根本调不动北洋军队。

军情似火。为了救命，小朝廷也就管不了那么多了，只好再次起用袁世凯。

袁世凯却不急不忙起来。你不是以足疾为名把我开回家吗？我的足疾还没好呢！什么？真心真意让我出山？那好，第一，给我指挥全线军队的实权，别只给个湖广总督糊弄我。第二，免去荫昌的第一军军统职务，任命冯国璋为第一军军统，段祺瑞为第二军军统。荫昌不是我北洋军人，凭什么指挥我的军队？要打，由我的左膀右臂来打。

小朝廷早已经没有了讨价还价的资格，对于袁世凯的条件，全部答应。袁世

凯心满意足，这才慢腾腾地出了山。而冯国璋，也就接替荫昌，成了第一军的军统。

讲到第一军，就得多说几句了。因为第一军对于直军来说，实在是太关键了。先看一下第一军三员大将的名单：

第四镇：署理统制官陈光远，字秀峰，直隶武清人；

第二镇第三混成协：协统王占元，字子春，山东馆陶人；

第六镇第十一协：协统李纯，字秀山，天津人。

这三个人，就是后来冯国璋系统直军的三员主将、著名的“长江三督”。

第一军的高级将领，清一色是日后直军的重镇，这恐怕不单纯是一种巧合。

应该说，冯国璋此时，已经在有意识地培养自己的势力。第四镇的统制，本来是吴凤岭，陈光远在第四镇中只是第八协协统。冯国璋一接第一军，就以作战不力为名，免去吴凤岭之职，将陈光远提为署理统制；王占元和李纯这两个协统，不久也被冯国璋分别提升为第二镇、第四镇的统制。日后北洋军分裂，陆军第二师、第六师成为直军的基干部队，就是从这里来的。(二、六两师的前身就是第二镇、第六镇。第四师先落入皖军手中，后归孙传芳系直军。)

冯国璋的这些举动，未免太有点“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了。陈、王、李三人，也正是因为跟了冯国璋南下而得到高升，从而成为冯国璋的大将。直军的小圈子，从此就见了雏形。

除了第一军，后来纳入直军系统的禁卫军，也是冯国璋这次南下时得到的。

禁卫军是清皇室的亲军，1908年末开始编练。原来的规定是，这支部队由监国摄政王载沣亲自统辖、调遣，实际由载沣之弟载涛控制。1911年8月，禁卫军正式成军，由监国摄政王亲自校阅、颁发标旗，兵力则相当于新军一镇(辖两协)，任务是宿卫宫禁。

这样一支皇室亲军，怎么落到冯国璋手中了呢？

原来，冯国璋任了第一军军统之后，率领陈、王、李三员战将，猛冲猛打，几天之内，便接连打下了汉口、汉阳。捷报传到北京，小朝廷一片欢声笑语，立刻便有上谕下来，封冯国璋为“二等男爵”。冯国璋自然是感激涕零，表示“愿为朝廷效死”，一鼓作气，再拿下武昌，“剿平乱党”。

不料，袁世凯却另有打算：他正准备利用革命军的势力压迫清廷退位，自己取而代之呢，这武昌，自然也就不能再打了。

偏偏冯国璋未能领会袁世凯的意图。袁世凯暗示他“停一停，放一放”，冯国璋却迷迷糊糊地回答说：

“只有精忠报国，不知有他。”

袁世凯哭笑不得，又怕这个不识时务的“二等男爵”果真打下武昌，坏了